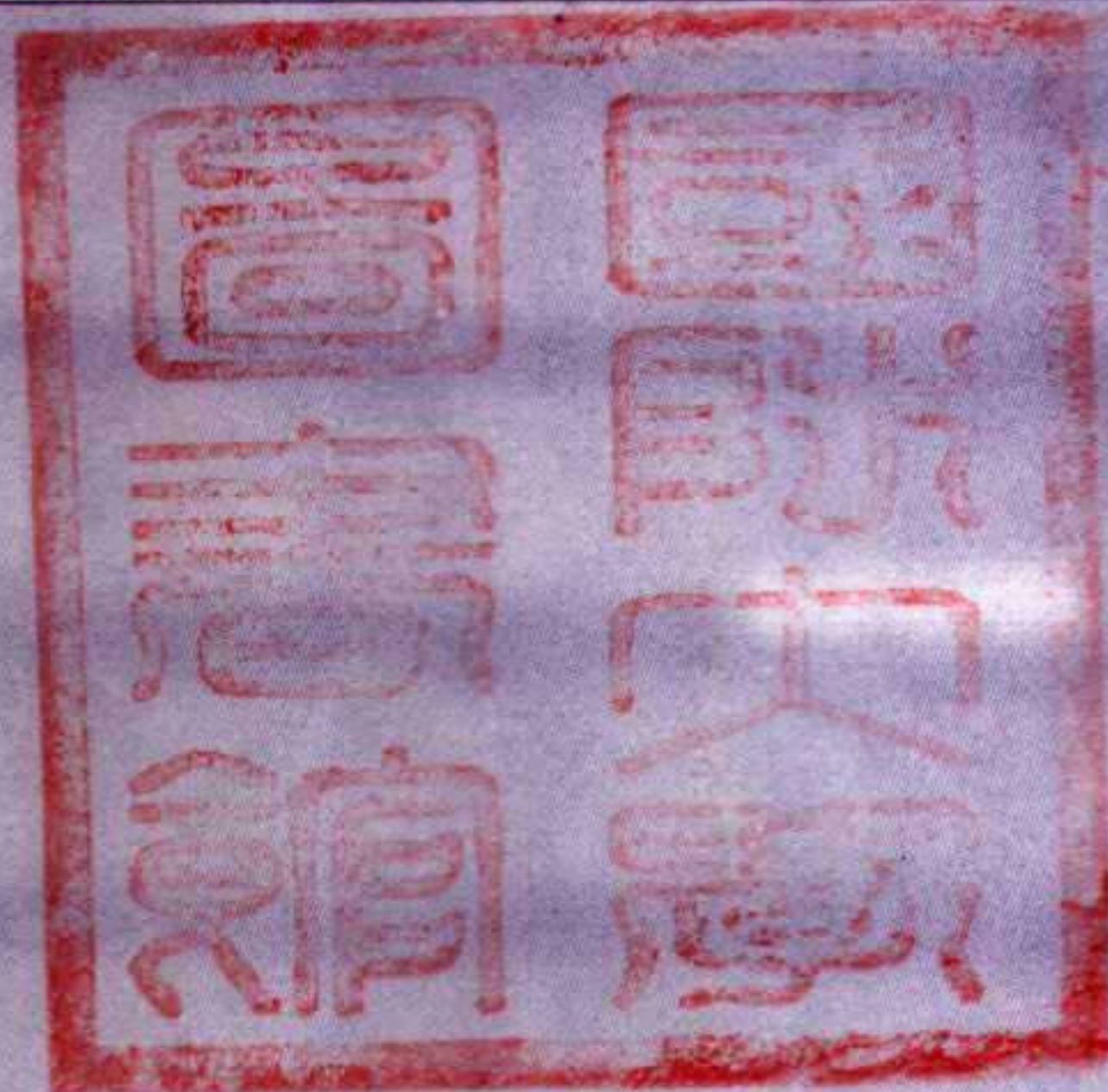




张晓霞 / 著

中国 高层智囊



目 录

刘鸿儒：这个人物不寻常／1

江泽民与刘鸿儒的两小时交谈

朱镕基请刘鸿儒“出山”

股灾消防队员

证监会成立之初的窘境：租房借钱

刘鸿儒和高西庆是H股顺利出台的“催生婆”

第一批企业海外上市内幕

谈笑有鸿儒

徐匡迪：专家从政的典范／37

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

海派学界带头人

由科技而进入经济领域的政治人才
大陆惟一的院士市长
六亲不认订家规
与克林顿共同主持热线节目
朱总理说“每逢有科技和经济方面的计划
我都要问一问徐匡迪”

陈云林：鼎力寻求国家统一途径的神秘人物／61

“调职”风波
与辜振甫交锋
台岛的“北京热”忙坏了陈云林
大陆不需要做任何“政治秀”
鼓励台商“登陆”

王 山：一个民间思想者是如何撞开现实政治的大门的／77

“洛伊宁格尔”的奇书
作者是个可疑人物
“欺世盗名”的民间思想家
王山：思想和动机全解密
围绕王山的各种评价
他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生意人王山及其“流氓”风格
奉劝他国：不要干预我们

韩德强：以“道德市场经济”对撼“市场浪漫主义”／115

“入世”预警获高层重视
中国应该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批驳何清涟，为“道德市场经济”鼓与呼

惊世骇俗的盗版经济有理论
西部开放：爱与痛的边缘
落后就要挨打吗？

乔 良：超越既往战争理论与规则的博弈高手／157

幻想者的天堂： 《末日之门》
120位将军同读《超限战》
战争的万花筒被利益之手摇动
一位将军说：未来战争怎么打有必要去问问乔良
沙漠风暴：一只经典的“苹果”
笑看美军摸“大象”
《超限战》再版七次，仍有人对它定位不准确

时殷弘：谋士的忍者之道／189

被外电“爆炒”的中国军事谋士
《尼克松主义》使他一举成名
有人说他是亲美派
民族主义就像一把双刃剑
一个悬念：21世纪谁当头？
建议创立东亚集体安全体系

资中筠：中美关系不是“无底的棋盘”／225

资深“美国通”
中美不是必然走向对抗
客观看美国
怎样做大国
“全球化”与中国
一不小心译出《廊桥遗梦》

孙 津：从无人问津、指涉迷津到津津乐道／271

高宝湖边学马列

现代化的穷追富

“不争论”的理论

说中国政治改革滞后是一种误解

设计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给合理分配一杆秤

预见“三个代表”的转折

让“农民负担”失去意义

刘鸿儒：

这个人物不寻常

在深圳、上海两个证券交易所诞生之前，中国的证券交易市场其实已经经过了十年时间的起步和培育。198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市支行就代理企业发行了211万元股票；1982年深圳宝安公司也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1984年9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发行定期三年的股票；1986年8月，沈阳信托投资公司首先开办窗口交易，代客买卖股票和企业债券；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拨资金组建了33家证券公司，财政部也组建了一批证券公司。当时中国的股票市场可以说率势待发。可是，如何去引导并花大力气建立规范的证券交易体制，抑或干脆将其扼杀在摇篮中，种种争论不绝于耳。

江泽民与刘鸿儒的两小时交谈

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亲身参与和推动了这一新

生市场的建立与发展。1986年的某一天，美国证券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刚刚启动的股票市场发生了兴趣，想寻找一张股票带回美国。刘鸿儒后来回忆道：当时我拿来天桥商场股票一看，定期、定息加分红，严格讲不能算是股票，只好紧急打电话给上海，他们送来了1984年1月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由于相对比较规范，就将其送给了美国人。于是美国纽约交易所的展览柜台里有了新中国的第一张股票。

从自发发行股票到分散交易，国务院始终关注资本市场建设，经过组织研究，1985年4月，一份建议集体企业、国营小企业采取股份制经济形式的研究报告摆上了国务院的办公桌。其后，1988年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开始试点，然而深圳市场推出的深圳发展银行和万科公司的股票却发不出去，不过事态很快出人意料地发生了逆转。1990年5月，“股票热”烈火熊熊燃起，优厚的分红派息方案以及发行限额使之供不应求，勾起了人们的股票发财梦。盲目抢购之风盛行，交易场所人山人海，甚至要出动警察维持秩序，刘鸿儒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实地调查时的热闹场面。

自发分散交易带来的弊病已经显露无疑，缺乏法律规范管理，透明度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对社会安定已经造成不良影响，局面已经发展到了是取缔还是规范发展的选择关头。

深圳股票热中有人暴富，引起了高层人士的关注，刘鸿儒三次率调查组深入到深圳、上海的交易网点实地研究对策。同时传来了股票市场是搞私有化，应当取消股票交易的声音。1990年11月，深圳市、珠海市举办特区建立十周年庆典，江泽民带领各部门领导出席。此次他是带着问题而来，在返回北京的飞机

上，他同刘鸿儒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临下飞机江泽民作出指示：上海、深圳两个试验点要保留，继续试验不能撤，但是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

此后，劫后余生的股票市场振作精神，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相继诞生，从此结束了各自为政、分散交易的时代，标志着证券市场由自发分散走向集中统一规范发行和交易的新时代。刘鸿儒告诉记者，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然而有关证券市场姓“资”姓“社”的争论仍在继续，困扰着证券市场的发展，由于风险大、争议大，证券市场基本处于维持状态。直至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姓氏争论才得以冰释。

朱镕基请刘鸿儒“出山”

1992年10月，中共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同时这个月对中国金融业尤其是证券业来说，也无疑是具有纪念意义的月份。

因为在这个月里，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成立了。与此同时，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国务院证券委）也宣告成立。

这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监管体制开始形成。

国务院证券委是国家对证券市场进行统一宏观管理的主管机构。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依照法律法规

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

国务院证券委主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中国证监会主席则是刘鸿儒，他同时兼任国务院证券委副主任。

在中国政坛上，谁都知道，朱镕基是经济工作方面的专家型领导，香港媒体甚至称他为“经济沙皇”。国务院证券委由他担任主任，说明中央对证券监管工作极为重视，也说明这个机构的高层背景。

同时，朱镕基纵然担任这个机构的主任，但他日理万机，只能处理涉及大政方针的重大问题，日常工作自然由兼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刘鸿儒来主持。

由此可见，刘鸿儒的地位和作用非同小可。

刘鸿儒何许人也？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

“我1992年10月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此前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两年多，在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金融改革尤其是证券市场建立方面。另外从80年代初开始，我在中国人民银行干了10年副行长，主抓金融体制改革。可以说其他方面都有框架了，惟独证券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还没有趟出一条路来，所以我决心把这项工作做完。”

为了了解刘鸿儒这段话，有必要交代一下中央关于股票场所开展的一些工作。

早在1984年，刘鸿儒就担任金融改革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主持整个金融改革方案的制定。最初，该小组设计的改革方案主要是关于银行方面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由于非常敏感，也没有经验，争论一直比较多，有很大的理论“禁区”，所以一直没有作为改革的重点。

在1985年中央讨论“七五”计划建议时，其中关于金融改革的内容中提到了资金市场的问题。

1986年，中央选择了5个城市——沈阳、大连、常州、重庆、广州做金融改革的试点，主要就看如何让当地的金融市场活起来。当然，当时的实验主要是针对资金拆借市场，证券市场仍然没有作为重点。

这时候，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自发的债券和股票的二级市场。比如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就开办了股票、债券的窗口交易，规模很小，既无法规可循也未经审批；工商银行上海静安区支行也有了柜台交易，非常原始，交易价格都是写在黑板上。

为了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成立一批证券公司，专门做经营和中介业务，以便有组织地推动这项改革。证券公司的经营品种主要是国债，也包括一部分企业债券和企业自发的股票。人民银行还为此拨了一笔资本金，大约30个亿。

1987年，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市证券公司成立。

1988年在人民银行牵头下，各省的证券公司纷纷成立。它们对于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所说的“中国第一代证券人”，主要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之后一直到1990年深圳市窗口交易引发热潮，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引出了“中国的股票市场要不要保留”的问题。

关键时刻，江泽民果断拍板，中国的证券市场还是保留了下来。

由于当时股票发行量已经很大，股票市场的资金也达到了一定规模，于是有人提出意见：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其中在有一年的人代会上，16位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个议案，建议成立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但后来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这一阶段股票市场发展的还大都属于金融方面，由中国人民银行归口管理，下设金融机构管理司具体负责。但是，由于股份公司的试点是国家体改委在抓，涉及国家计划项目、资金总量的盘子等等是由国家计委统一规划，当时的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沪、深两地，两个交易所也都是由地方政府管理，于是形成了多头管理的局面。其实主要原因还是当时没有把股票市场作为重要的问题来解决，也没有作为改革的重点。

1990年左右，全国上下股票非常热，中央对到底该不该搞、该怎么搞证券市场的问题争论得相当激烈，不得不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讨论这个问题。

国务院领导决定由刘鸿儒牵头做组长，组织了体改委、人民银行等部委的人，到深圳和上海做了三次调查。

为此，刘鸿儒也曾多次向国务院做过汇报，所以对这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一些。后来急着成立证监会，在确定主席人选时，很多人包括当时一些年轻人等建议让刘鸿儒来出任。

不久，朱镕基找到刘鸿儒，要他“出山”，做新成立的证监会主席和国务院证券委的副主任。

其实，朱镕基在上海做市长时，刘鸿儒带领中央证券调查研究小组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曾找过熟悉经济工作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共同研究过许多问题。后来朱镕基也曾就许多问题找刘鸿儒做“参谋”。所以他们彼此之间比较熟悉，是老相识了。

朱镕基找刘鸿儒谈了几次。刘鸿儒感到了一定的压力：证券市场可是烫手的山芋啊。然而当时成立证监会的事情比较急迫，已不许再拖了，刘鸿儒终于答应下来。

什么原因促使中央这么着急成立证监会呢？

证券委和证监会成立的直接原因，应当说是1992年发生了著名的深圳“8·10”事件；而根本原因，则是证券市场的迅猛

发展对加强统一管理提出了内在要求，中央决定要有组织地推动这项改革。

“8·10”事件的关键是技术问题没有处理好，结果导致了政治问题，对中央的震动非常大。事件平息后，中央立即作出决定，成立专门的证券监管部门，以改变时而多头管理、时而无人管理的状态。

中央在决定成立专门机构后，紧接的问题就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朱镕基为此曾多次召开专家座谈会，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总结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美国模式”，特点是监管机构高度集中统一，权力比较大。但它又不是政府机构，而是直接归国会管，类似于中央银行。它集所有资本市场的监管职能于一身，既有政府职能也有法律部门的执法权力，其他部门都不参与。

第二种是“英国模式”，以自律监管为主，比较松散。

第三种是“香港模式”，即设立一个准政府机构，不列入政府序列，不作为政府组成部门，但执行政府职能。

当时主管考察工作的刘鸿儒还专门到香港考察过，发现这样设计主要是因为证券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很强，特别需要高级的专门人才，待遇要高于一般公务员；而进入政府序列，待遇问题解决不了，吸收高级专家就有困难。但是与美国一样，香港证监会的管理职能也是高度统一的，政府在这方面的监管职能全由这一家机构来承担。它的资金来源是收取的监管费，即交易所将交易费用的一半上缴证监会。

经过反复研究以后，中央认为“香港模式”值得借鉴，于是决定新成立的证监会是一个准政府机构，也称事业单位，但是执行政府职能。同时也考虑到今后要能吸收一大批专家。

最后，国务院设计了一个中国证券市场的四层监管体系上报

中央，并得到了批准。

根据设计，这四层体系为：

第一层是社会监管体系，主要指的是中介机构，包括注册会计师、律师等。他们要对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的招股说明书、财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法律意见书等进行审核、签证，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层是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经营机构组织的证券业协会，属于自律性监管体系。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主要对扰乱股票市场、妨碍稳定和健康运作等主要来自从业机构内部的因素进行监管。所有国家都把自律监管的制度作为一个对付不法行为、防止市场混乱的重要防线。

第三层就是准政府性质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政府赋予监管委员会有关证券市场监管的权力，它的人员由有证券方面知识和经验的人士以及有关专家组成——他们不能同时在其他政府机构和营利机构任职；主席和委员由国务院任命。

第四个层次是政府管理机构，这是中国专门加的一个层次。考虑到政出多门，各部门矛盾也比较多，所以中央设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来统一协调股票、债券和国债的有关政策，负责宏观管理和指导、监督证监会的工作。这可以说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

证券监管机构的设立，在解决统一监管方面应该说大大迈进了一步。由于当时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的工作十分紧迫，许多问题一下子调整和规避有困难，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当时的证券经营机构还是归中国人民银行管理；沪深两地的交易所行政上归地方政府管，业务方面归证监会管，两者存在矛盾；证券委下设了办公室，其工作和证监会基本重复，等等。从实践发展来看，这些问题后来都逐步得到了解决，而且其职权

范围随着市场的发展逐步扩展：

1993年11月，国务院决定将期货市场的试点工作交由国务院证券委负责，中国证监会具体执行。

1995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编制方案》，确定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副部级事业单位，是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证券期货市场进行监管。

1997年8月，国务院决定，将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统一划归中国证监会监管；同时，在上海和深圳两市设立中国证监会证券监管专员办公室；11月，中央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国证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理顺证券监管体制，对地方证券监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并将原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的证券经营机构划归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

1998年4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将国务院证券委与中国证监会合并组成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经过这些改革，中国证监会职能明显加强，集中统一的全国证券监管体制基本形成。

1998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进一步明确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进一步强化和明确了中国证监会的职能。

至此，多头管理的状态得到了改变。

股灾消防队员

上任伊始，由于股市规模发展受到限制，刘鸿儒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强化规范、防范风险上，当然救火工作也没少做。目标很明确，把市场风险降低到最小。先是《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炉，后是《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出台，这些法规在以后的若干年为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提起此事，刘鸿儒认为，这是他担任证监会主席的主要贡献之一。

刘鸿儒告诉记者，深圳“8·10”事件实际上是由技术问题引发的社会不安定。为了改革股票发行方式，他曾专程到香港取经，在北京燕莎写字楼与台湾同行详谈了两个整天。当时，曾想采用香港的办法，采用个人认购，预先缴款，锁定认购款，但是由于银行做不到，未能实施。最后采纳了台湾的办法，无限量发行，先发行认购表，抽签决定，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1993年7月青岛啤酒首次采用新的发行方式发行股票，证监会派出了20多人的实地考察组，结果中签率很低，但发行过程稳定。刘鸿儒说，尽管当时知道采取这种办法造成了人力和纸张的浪费，但是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只好为之。以后，股票发行改革为存款单方式，再以后进一步发展为网上发行，在股票发行的探索过程中，我们是花了成本的，可是求得了社会的安定。

刘鸿儒说，防范风险有一个进化过程，完全杜绝风险不可能，要在解决市场遇到的问题中不断修改完善法规。证券市场十

年发展的另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健全立法，严格执法。只有依法治市，才能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才能使市场健康发展，才能使不同方面的利益冲突得到平衡。

刘鸿儒说：我在证监会有一句名言，上市公司质量是证券市场稳定的基石。担任证监会主席以后，刘鸿儒曾经对各国股灾进行过研究，以印尼为例，起初印尼的证券市场由于环境优越，吸引了大批的外国投资者，但是一年以后，就是由于一家上市公司披露虚假财务信息，使得外国投资者对该市场失去了信心，最终撤走资金，市场一落千丈。

证券市场就像一座百货大楼，如果卖的商品都是假冒伪劣，再辉煌的万丈高楼，早晚也要倒塌。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证券市场都是垮在上市公司质量问题上——刘鸿儒这样告诉外界。在实际工作中，他主持建立了发行审核委员会，同时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刘鸿儒曾经在苏联专心学习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对股份制的论述中他找到答案，即股份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可以导向共产主义，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利用。然而实践中存在的难题是，如何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特征的证券市场。

于是在证券市场发展的最初阶段，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成为许多政策措施的出发点。1993年11月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生产某些特殊产品的公司和军工企业应由国家独资经营，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的骨干企业，国家要控股并吸收非国有资金入股，以扩大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and 影响范围。与此相联系，在股份制试点中内部议定了，国有股必须达到控制程度，个人股实际持股比例在40%以下，由此，证券市场出现了特有的